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 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8年3月19日
总第32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法藏敦煌遗书数字资源已正式在线发布

本报讯 近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数字资源正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发布。该批资源共计 5300 余号 3.1 万余拍，包括存世最早的拓本文献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沙州都督府图经》等，读者可登录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在线进行检索和全文浏览。

此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和在线发布，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回归工作的重要阶段成果之一。

据悉，2007 年以来，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积极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回归工作。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永乐大典》50 余册、日本岩屋寺藏《思溪藏》等一大批海外中华珍贵古籍实现了数字化回归。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书目数据库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完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编撰出版项目正式启动，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也于 2017 年正式实施。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圆明园四十景图》期间，双方即达成新的合作意向，由法国国家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法藏全部敦煌遗书高清数字资源。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两年时间，实现了这批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和在线发布。

这批敦煌遗书包括汉文文献 2700 余号、藏文文献 4000 余号，此外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总数达 7000 余号。截至目前，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在内，“中华古籍资源库”资源发布总量已超过 25768 部 1000 余万拍。（晓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检索号查找方法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及线装旧籍文献约 65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约 5 千部 6 万册，以明代版本为主，余皆清代初、中期版刻和稿本、抄本。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以四川地方志书、谱牒，历代川籍学人著述，中医典籍，佛、道藏文献和清代以来四川版刻书籍为特色。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于 2007 年底在四川省图书馆正式挂牌成立，目前有古籍普查工作人员 12 名，修复人员 7 名。十几年来，该中心已成为全省的古籍普查登记中心、古籍保护培训中心、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古籍数字化建设中心。为加强组织领导，四川省还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形成了覆盖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和上下联动的运行机制。

1 普查登记，摸清家底

据初步统计，目前四川省 92 家公藏机构共收藏汉文古籍（含民国线装书）约 220 万册，其中四川省图书馆藏有约 65 万册。十年来，通过登记全省古籍的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数、书影等普查信息，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全省已统计古籍收藏单位 92 家，已完成古籍普查单位 60 家，完成普查数据 139720 条约 130 万册，且需进一步完善，约占全省古籍总藏量的 59%；20 家单位普查工作正持续进行，12 家单位还未开展普查（其中蒲江现场查看因破损无法著录）。

为确保全省古籍普查于今年底基本完成，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连续两年开展“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普查中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献，如南充市图书馆藏明刻本《唐陆宣公集》、绵竹市图书馆藏明末汲古阁刻本《焦氏易林》、井研县图书馆藏明嘉靖内府刻本《文献通考》等。

3 传统技艺，科学修复

经过十年努力，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在传统修复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修复水平不断提升。一批善本古籍如明抄本《诸症辨疑》、稿本《蜀典》、弘治本《大明弘治甲子改并五音集韵》等得以抢救修复。

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先后成为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分中心。2016 年 8 月，在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的努力下，三家单位跨系统联动，挂牌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

5 开发利用，化身千百

四川省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等再生性保护成果显著。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已累计完成数字化古籍六万余拍，影印出版四川省图书馆藏宋刻本《茶经》、明刻本《花间集》、清初刻本《陈章侯画水浒叶子》、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清董邦达等工笔设色手绘绢本《四川全图》、泸州市图书馆藏明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等善本 23 种，整理出版《第一批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获得四川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 改善环境，分级保护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长期致力于改善存储环境，努力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等，并建立分级保护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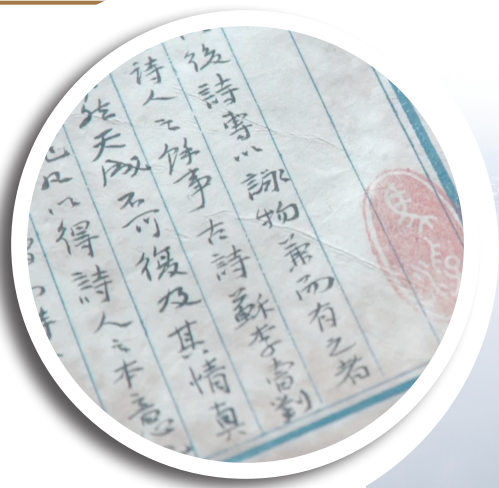
目前，四川省已有成都市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南充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博物院 7 家古籍收藏单位，被评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自贡市图书馆等 14 家单位被评为“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广汉市图书馆等 12 家单位被评为“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

此外，全省共有 237 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73 种古籍入选《第一批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经过十年的努力，全省万册以上的古籍收藏单位正在逐步建设标准书库，古籍保护设备与设施得到改善，珍贵古籍得到有效保护。

4 人才培养，薪火相传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加强全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十年来，相继培养古籍整理与编目、古籍修复等专业人才 500 余人次。其中通过老带新、小班制培训、选派基层古籍编目人员到四川省图书馆实习等方式培训古籍整理与编目的中级与初级人才；通过举办古籍普查与编目高级研修班，选派优秀古籍编目人员前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学习等方式培养古籍整理与编目高级人才；通过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各级古籍修复人才。古籍保护人才分级分层培养模式已初步形成，一批责任心强、有一定专业技能、综合素质较高、层次较为合理的古籍保护人才梯队已初步建立。





看似『捡漏』的背后

在天泉山房邂逅民间藏家

□葛芸生

薪尝胆，至魏晋望族王（羲之）谢（安）呈现的古越文化第一次辉煌高峰，再到明朝形成的以王阳明“心学”为标志的二度辉煌，继而是在清末民初之际，涌现蔡元培、鲁迅、马一浮等群贤毕至的又一次辉煌。我和方俞明自幼就在古越文化氛围中成长，集藏定位也是绍兴一府八县的地域文化，希望尽自己所能将散落各地民间的古越文献典籍，一点一滴收集起来，这是我俩义不容辞的一份担当。”

天泉山房的命名缘自古越先贤王阳明。王阳明辞官回乡后，在祖居地绍兴创办书院，倾心教授传统文化。在天泉桥上，王阳明宣讲“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走近天泉山房的藏书楼，我见到王阳明文献专柜，里面满满地存放着王阳明著述的多个版本、以及阳明弟子王畿的著述《王龙溪先生集》、钱德洪编撰的《王阳明先生年谱》，还有一批不易见到的民国影印本。

在宽敞的书库里浏览了两个小时，我有缘亲近沉淀着古越特色的善本文献、望族大姓的家谱、吴越各地的方志，还有相当数量的碑帖拓片、汉砖造像和木活字。

令我钦佩的还有书香清雅的“山房”韵味，以及周到的服务设施，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公开度的阅览便利、住宿与餐饮。

天泉山房，来自于民，服务于民，称之民间藏书楼，实至名归。

黄酒般醇香的专藏

原本以为，民间藏家集藏本地文献，似有天然的地利优势，可自我邂逅天泉山房之后，才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也进一步体察了民间藏家的苦衷。比如很多原著大多并不在此地了，就给民间藏家集藏增添了困难。然而，书籍的价值毕竟在于它的流通与传播，故迎难而上、苦尽甘来，已属民间藏家历练许久的共享体验了。

方俞明对此有颇多个人感受。他跟古籍打交道，是从喜欢跑旧书店开始的。1989年，有一家晚清老字号书铺在绍兴鲁迅路重开新店，店主精心设置了“绍兴人文古籍”专架。方俞明就是由此开始了漫漫买书、藏书之旅，但绍兴的旧书并不太多。后来，他偶然间从买来的旧书上，发现了贴有杭州古旧书店的标签，便去到杭州找书。严宝善师傅当年在杭州古旧书店坐堂，见到绍兴来客，即向方俞明讲起去绍兴收购旧书的那些往事：常常在绍兴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待旧书够装一船了，便雇人运往杭州，自己

仍留在绍兴找书。严师傅特别提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南京、苏州、扬州等古旧书店，都曾派专人在绍兴购书，因为绍兴名人辈出，藏书家也多，坊间流行一个说法：“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近代史，半部在绍兴”，可见绍兴享誉“文献之邦”由来已久。

受到启发的方俞明，痛感绍兴文献的流失，从此，他藏书除个人爱好外，又增多了几分责任：每到一座城市，他都要去当地古旧书店，寻找绍兴文献。尽管收入有限，凡能承受的他当即买下，点点滴滴地积累，也渐渐积累着与绍兴古籍的缘分。

方俞明觉得，集藏古籍是少不了缘分的：如欲集藏某位先贤的著述，到手时未必齐全，可能先有一两册，但同一部著述往往会有不同的版本。主观上想要某个版本，很长时间不能如愿，竟然会在某一瞬间冒了出来。缘分一到，就看自己能不能抓住了。

有一次，他获知北京某拍卖会上，将有20余件拓片作为同一标的出现。拍卖图录里只说是一堆拓片散件，未提藏家，也没说拓的年代，且仅有其中的一件上了图录。不愿放过任何机遇的方俞明，硬是从图录录入的那件拓片里，发现了一方不很清晰的小印，确认其为徐维则（1867—1919，浙江绍兴人，近代藏书家）之印。碍于印文用了异体字，一般不易辨认。到了拍卖预展现场，汪柏江又发现同一标的拍品尽系徐维则旧藏，它们于晚清在绍兴存留过。这批散件包括了大禹陵空石碑与几块汉、南齐、唐朝金石晚清拓本，于是他俩决定买下，当藏品拿在手里时，不仅惊喜，更庆幸并感激这一缘分。

事实证明，他俩的“捡漏”，值了。

“捡漏”背后的扎实工夫

“捡漏”，是古玩界的一句行话，指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

明眼人都知道，“捡漏”耗去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贵似黄金的生命岁月。

民间集藏，与公藏相比较，其差异若就“开源节流”而言，民间集藏大多属于“节流”，“捡漏”自然属于“节流”的重要途径，“节流”也最能检验民间藏家的心力与眼力。

天泉山房精准定位在绍兴的“一府八县”，是一种睿智，也权衡了自身的“心力”，多少汲取了王阳明的理念。“心力”并非随意地天马行空，“心力”必须要落在“行”上，即“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能将“心力”倾注于精准的

定位上，集藏便有了质的提升。这方面，天泉山房两位楼主在集藏抄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时，有颇多启示。

那是一次在绍兴举办的拍卖会，琳琅满目的拍品中有三件抄本未获足够关注：一件题为《凝香阁诗稿》，一件题为无名氏《手抄诗》，还有一件题为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前两件上了拍卖图录，后一件没上。三件属于同一标的，因抄写的年代在民国，拍卖方采取了无底价起拍。方俞明在预展首日看了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起初也感觉品相欠佳，抄者未署名，抄本年代距今比较近。但他仍然坚持认真翻阅抄本，终于意外发现了一枚椭圆形印章，印文为“马浮”二字。

马浮即被收藏界视为“奇人”的马一浮。方俞明此前虽见过马一浮的笔迹和印章，却与眼前的抄本有异，它会不会是马一浮的早期真迹呢？两天预展期间，方俞明研读大量史料并缜密考证，认定其为马先生二十多岁时的手迹，便毅然出手“捡漏”，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拿下了同一标的三件抄本。

事后，经与某次展览中的马一浮早期手迹与印章相核对，进一步佐证了当初竞拍时的判断，确属马一浮真迹。

那么，马一浮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撰写了这一抄本呢？

马一浮（1883—1967），绍兴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16岁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年在绍兴科举，马一浮名列榜首。次年起留学美、德、西班牙、日本，掌握七国语言。1904年病中的他，得到一本马克思《资本论》（英译），当天在日记里写下：“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他也借此成为中国最早研读《资本论》的人。1911年回国后，他在杭州潜居寺庙，从早到晚于邻近的文澜阁里，通读《四库全书》，倾心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马一浮边阅边抄，并进行版本比勘，故在抄本上留下不少批注校勘的字迹，其文献价值已溢出抄本了。

临别之际，汪柏江告诉我：“二十多年来，天泉山房的集藏有了一定规模，我们没有沾沾自喜。将这么多古越文献集中展示，为的是让更多人敬重古越文化，也让后来者不再轻视古越文化。”这一番积淀着心志与甘苦的话语，至今仍在耳旁萦绕。

邂逅天泉山房启迪了我：集藏不仅仅是保存，集藏当是一种发现；衡量藏品的价值也不仅仅视数量多寡，关键仍在对藏品质量的研究与提升。

近二十多年里，我曾多次造访古越文化发祥地——绍兴。每次或因祭祀大禹陵专程拜谒，或慕“书圣”之名徜徉于曲池兰亭，或仰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去品尝一碟茴香豆。

2016年，为纪录片《古籍今传》的拍摄，我又一次来到绍兴，并在此地邂逅了一座不寻常的藏书楼——天泉山房，感受到了民间藏家的心志与甘苦。

一座不寻常的藏书楼

临湖而立的天泉山房，是一处多功能民间藏书楼。楼主汪柏江、方俞明多年来只有一个心愿：传承并弘扬优秀的古越文化。

汪柏江对我说起集藏的初衷：“我从骨子里喜欢古越文化，每深夜深时它都会令我心灵宁静，这是语言难以表述的。自夏禹会稽庆功，经勾践卧



近日，一通傅增湘（1872—1949）向友人推销《道藏》的书信现身拍场，笔者有幸获见。此信尚未见有公开披露者，颇具研究价值，殊为难得。为此，酌加整理，转录信文如下：

慎之先生，执事敬启者：京师白云观《道藏》为海内孤帙，古本秘籍多世不经见之文，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现在影印开始登报发售预约，亮荷鉴及。惟是书卷帙浩繁，印行仅以百部为限，因念台端耽研典籍，素广搜罗，倘承推爱，酌量购置，俾广流传。高谊雅怀，同深企仰。附呈书目四册，样本一册，并希督存如荷。订购敬祈按预约办法将款汇交该馆，或逕交敝处代为转交亦可。统希酌督办理为幸。专肃祇请台安。

弟傅增湘拜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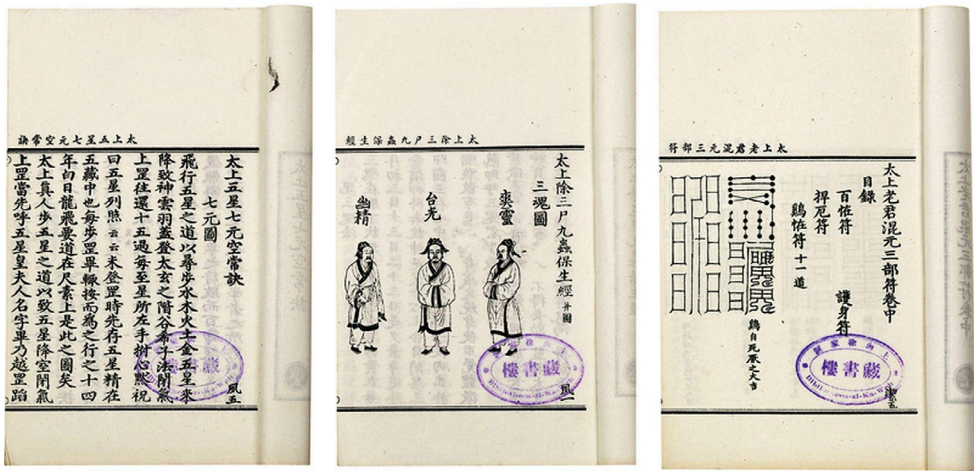
收信人“慎之”，即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现代著名藏书家、学者。他是同为著名藏书家、学者的卢靖（1856—1948，号木斋，曾为首任直隶提学使）之弟。卢弼早岁肄业湖北经心、两湖书院，受教于杨守敬、邹代钧；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等要职，撰有《三国志集解》《三国志集注补》《三国志引书目》《三国志职官录》及《三国志地理今释》等，还曾与其兄卢靖共同编校刊印“慎始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等大型丛书。

事实上，傅增湘与卢氏兄弟，有多年交谊。首先，作为第二任直隶提学使的傅增湘，与第一任的卢靖早有公务交往，在文教、图书馆地方事业建设上多有交流，且同有藏书、校书之志趣，彼此引为同道。其次，傅增湘与卢弼在藏书、校书及版本等方面交往同样频繁，二人书札往还，常有切磋。傅增湘六十岁（1931）、七十岁（1941）寿辰之际，卢弼皆赋长诗祝寿，观其诗集稿本《慎园吟草》（今藏天津图书馆）中的《江安傅沅叔增湘六十生日》诗，可知二人情谊至笃。诗云：

藏家今数江安傅，雄视长安称独步。
寒舍兄弟皆同官，夙与君家有雅故。
迩来闭户亲典坟，君为大国我为附。
偶或囊书坊肆过，又或相笑令摊遇。
年年花事盛名园，文酒往还忘日暮。
叹息烽火无时无，抱残守缺惊心度。
贤哲精神所凭依，名山秘籍宜流布。
汲古照旧富雕刊，流传到今人争获。
君寿古人天寿君，请看做人百年树。

如上所述，傅增湘与卢弼的交谊，可称深厚。那么，傅向其推销《道藏》影印本的这封信，又写于何时？傅与此书又有何渊源，可使得他如此向老友荐举与推销呢？

其实，傅增湘正是影印《道藏》的发起人与推动者。诚如他信中所言，影印之事“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



圆，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在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期间，就已然着手推进此事了。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查证（详参：《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以下信文引述及相关数据均据此书），傅与商务印书馆方面商洽影印《道藏》事，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3月14日——傅在致张元济的信中称“前日奉复一函，为影印《道藏》事，计蒙察及”云云，这说明早在1918年初，影印《道藏》的工作，已进入筹划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18年3月，傅增湘自己还曾挑选出《道藏》中的《公孙龙子》《子华子》《黄石公素书》等数种，以其藏书楼“双鉴楼”名义自行影印过一批《道藏》单行本。这一方面足见其对《道藏》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或可视作对商务印书馆承印《道藏》全部的某种示范样本吧。

然而，影印《道藏》的工作进度，并不理想。过程中，或因当局主事者人员变动，或因借调《道藏》原本被白云观方面拒绝，更因《道藏》原书卷帙浩繁，影印工程浩大，成本支出庞大，以及京沪两地合作操办与销售难题等主客观原因，至1922年末，工作仍未告竣。

因傅增湘早在1919年即已从教育部离职，当局对《道藏》影印工作的支持力度，也有所消减。好在还有笃信道教的北洋政府前总统徐世昌垫资，以及傅增湘调用在北平多年经营的人脉从中斡旋，使得《道藏》影印工作终于在1923年初接近尾声。但《道藏》影印本的销售问题，始终还是商务印书馆方面最为担心的问题。当时，一部《道藏》影印本的定价为1000银圆之巨（预约订户略有折扣），绝非普通学者与一般读者所能承受。虽仅拟初印100部，但销路何在，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须知，1000银圆在当时的北京，可以买下一座颇不错的四合院了。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购置一座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也只花了800银圆。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

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将近200银圆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他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刚好花了1000银圆。那么，买一部《道藏》就需花费1000银圆，其代价之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商务印书馆方面对此书的销路颇感担忧，也不无道理。

1923年2月3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提到，“《道藏》……推销办法只能专用感情”。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张希望傅用朋友关系去推销此书。4月15日，张又在信中说：“再《道藏》结算，共售出三十一部。希望尚有数部。但欲印百部，必须售出六十部，否则尚须垫本。尊处发出信件，务祈设法进行。今之阔人费去数百元真不过沧海之一粟，想此事总不至无希望也。”张信中提到的“尊处发出信件”云云，应当就是指傅向友人推销《道藏》影印本的专信；傅写给卢弼的信，应当就在1923年4月前后吧。

1923年8月1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提到，《道藏》“敝处实销，连尊处代招已购各户在内，共得六十部。私冀全书告成之日可望售去八十部。如此时局，如此书，可谓有成绩矣”。10月23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又称，“《道藏》预约共售出六十三部，后半印价当可足用”。显然，此时《道藏》预约数已经达到了商务印书馆方面“保本”的测算值，傅增湘的推销之力，应当对此有较大贡献。不久，商务印书馆又给垫资人徐世昌送去了十部，张元济又自订一部，傅增湘则自订两部，加之国内外学者仍订购踊跃，很快将仅印百部的此书抢购一空，市面上甚至出现了高于定价数百元仍竟购不得的“奇景”。

附注：

《道藏》，是道教书籍的总称，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典。这样一部大型道教文献典籍的结集，内容涉及道教各个方面，包括理论、历史、组织、教派，也相当多地包含了易学、医药学、养生学、哲学、地理学等，还保留了《道德经》《南华经》《淮南子》等各种版本，为道教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现存之《道藏》是由明成祖永乐四年，第43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明英宗正统九年又诏通妙真人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正统十年刊板事竣，共计5305卷。后世以刊板年号称其书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又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主编成《续道藏》。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74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每函依《千字文》顺序编号，经板121589块。正、续道藏经板传至清代，日有缺损。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经板全部被毁，仅有白云观存有原书全部。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在傅增湘的主持之下，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据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续道藏影印，缩改为石印六开小本，凡1120册，共印制100部。

傅增湘推销《道藏》

□四川 肖伊绯

藏在巾箱中的《五经》

古籍中的巾箱本，因其刻印精良、小巧玲珑，广受欢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巾箱本大多为明清以来的刻本，其实，它出现很早，而且都是抄本。

孔平仲在《珣璜新论》中说：“昔时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之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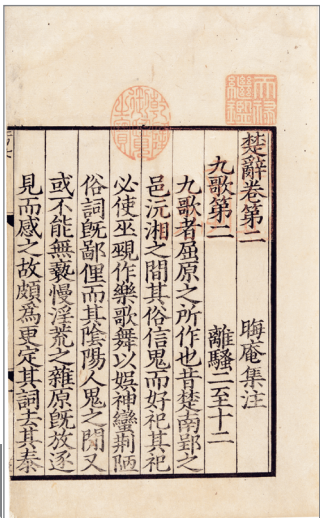
戴埴在《鼠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钧）手写《五经》置于巾箱中……今之巾箱刻本无所不备。”

南齐时文化比较繁荣，齐宗室中就出现过几位著名的文化人，如萧统编纂了大型的诗文集《文选》三十卷，萧子云编《晋书》一百一十卷，萧子良编成《四部要略》，萧

子显编纂《南齐书》等。因而衡阳王萧钧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立即受到很多读书人的效仿，于是“巾箱五经”一时盛行。巾箱本来是放头巾的小箱子，经萧钧这么一做变成了放书的器具。最初的手抄巾箱本字迹细密，体积狭小，主要是为了节省纸张，方便保管，后来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刊刻巾箱本依然保持字迹细密、体积狭小的特点，巾箱的制作也越来越工艺化，这时巾箱本的使用功能逐渐退为其次，观赏功能渐趋首位。清末出现的巾箱本，已有许多缩印本，但依旧受到人们的喜爱。

最初人们只是为方便保管携带，将手抄之书置于巾箱之中，没想到后来竟发展成一种古籍版本形式，这就是文化的传承。（翟超）

· 闲话古籍 ·



清宫旧藏宋本《楚辞集注》鉴赏

□北京 刘明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宋刊本《楚辞集注》，系清宫天禄琳琅旧藏。该本除见载《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外，绝少著录，殊为罕秘，且摹印颇佳，《书目后编》称：“宋大字本，极清朗。”其行款版式如下：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楚”和卷次（如“楚八”），下镌刻工姓名。卷一、卷三至四配清影宋抄本。卷端题“楚辞卷第一、晦庵集注”，次行低一格题“离骚第一、离骚一”。凡屈原之作次行上题以篇题，下则皆题以“离骚”及总篇次第，总七题二十五篇。

全书一函八册， 《后编》误作七册

书中卷首有朱熹《楚辞集注序》，次《楚辞集注目录》，均属影抄。全书卷二、卷五至卷八属印本，而《书目后编》云：“虽印本只四卷，而卷一、卷三、卷四影钞亦甚工致。以其希觐，足珍收之。”实则印本有五卷。据影抄之《序》已钤乾隆御玺，则可认定至迟抄在嘉庆初年入藏清宫之前。当时尚存另一部相同版本，故据之影抄以补为完帙。而《后编书目》著录为一函七册，经核查原书，原装书函已佚，装订为八册（一卷装为一册）而非七册。赵万里在编目草片中即明确称《后编》误作七册，此或与馆臣称印本有四卷而实则五卷有关，可能是漏计一卷。此八册均为清宫原装，彩锦书衣，黄绢包角，四眼钉线，书衣贴有黄绫签题“楚辞”。

汪氏藏印为何遭剗割？

原书叶即卷二第一叶有朱文大印一方，惜经剗割，馆臣称：“仅存一亭字可辨。”影抄《序》首叶尚留有印痕，仅约略识读出“□立□字□亭”诸字样（此据吴炬兄赐告）。兹复检原书，卷八首叶此印虽亦经剗割，尚可辨出印文首字为“汪”，为识读印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通过古籍类数据库检索，满足名“汪立□”和字“□亭”的是清人汪立名。《四库全书总目》称他“号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续文献通考》则称他“字西亭”。恰与印文暗合，且可推知“西亭”乃其字而非号。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汪立名约生活于清康熙间，藏书处

曰一隅草堂，藏印有“汪西亭氏藏本”“西亭收藏”和“歙州汪氏一隅草堂藏书”等，富藏书且喜刻书。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是此本中的汪氏藏印为何遭到剗割（汪氏所藏该本大致在嘉庆初入藏清宫天禄琳琅），以所附书影为例，可以看出藏印属大朱方，规制要过大“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继鉴”两方。结果是导致此两玺无法钤盖，且皇权至上也不允许有此规制的私藏印，推想起来此或为汪氏藏印遭剗割的原因。

考朱熹编撰该书之旨

朱熹《楚辞集注》最早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題》，题“楚辞集注八卷”（赵希弁《读书附志》同），即该本卷第。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题“楚辞集说”。或题“楚辞考亭注”，见《述古堂宋板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宋版集部著录此本，叙该书编撰之旨云：“王逸、洪兴祖详于训诂未得意旨，乃櫟括旧编定为此本。”即据自朱熹《楚辞集注序》所称的“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但也有其它说法，如《直斋书录解題》称：“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读书附志》亦称：“‘骚自楚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后编》引周密《齐东野语》进一步佐成此说，云：‘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盖以原汝愚皆宗臣，故以隐况而自拟宋玉，意不在駁正王洪也。’至《四库全书总目》综括诸说云：‘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笔者撰有《宋本〈楚辞集注〉考述》一文（载《天津学志》第九辑），提出：“‘有感赵汝愚之变’的说法，无疑丰富了对于朱熹撰写《楚辞集注》动机的深层次认识。”按《宋史·朱熹传》云：“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既相，以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

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朱熹因上疏忤侂胄而罢，赵汝愚力谏留朱熹未果。而至此年二月赵汝愚则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庆元二年（1196），又贬赵汝愚至永州，行至衡州而暴卒，《宋史》本传称“天下闻而冤之”。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准请开始退隐，《楚辞》之注当即作于此时。而注《离骚》为集注《楚辞》之始，周密《齐东野语》即称：“注《离骚》以寄意焉。”《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亦称：“南塘（赵汝愚）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遭受韩侂胄的政治打压则促使全部《楚辞》集注的完成，证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之宋嘉定四年（1211）杨楫同安郡斋刻本《楚辞辨证》，过录杨楫跋云：

“庆元乙卯（1195）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屢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编。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书目五种》中称：“熹一生注儒家经典几遍，更不为他所说所乱，独注《楚辞》似与平生专一之业相远，因以启学者之疑。”而结合杨楫跋及《宋史》记载推知，“朱熹撰《楚辞集注》离不开庆元政争的诱因，尤其与赵汝愚之变密不可分。南宋后期有关寄意赵汝愚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参《宋本〈楚辞集注〉考述》）按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遭诛杀，此后赵汝愚方“尽复原官”并“配享宁宗庙庭”，则“有感赵汝愚之变”的说法当出现在是年之后。《楚辞集注》完成于庆元二年至六年（1196-1200）之间，除《集注》外尚有《辨证》和《后语》，是朱熹毕生著述中的最后一部。

刻地及版刻相关细节，
仍待深入挖掘
嘉泰二年（1202），学

禁始放开，则此本之刻当在是年之后。检书中廊、匡、恒、緹、桓、廓诸字阙笔，避讳至南宋宁宗止，推断此本当刻于嘉泰二年至嘉定年间。检书中刻工有陈祥、董昭、方云、胡贵、简宗、金昭、李信、刘杰、陆弘、马、彭天佑（或作彭佑、彭右）、施、孙旭、王荀、吴、谢元、尤昌、俞魁、张荣、贞等，除陈祥、李信和张荣见诸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外，其余刻工均暂未见于其它宋元版书中，再次印证传本之孤罕！关于其刻地，笔者曾据其雕版槧法而审为福建刻本，在《宋本〈楚辞集注〉考述》拙文中又重新厘定为江西刻本。理由有二：其一，据陈祥曾参与宋抚州公使库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刊刻，佐证有刻于江西的可能性；其二，版刻风格近于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曹子建文集》，该本即经文禄堂主人王文进审定为江西本。当然，坐实刻地似不容易，尚需更多角度的深入挖掘。

现存宋本《楚辞集注》，尚有宋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刻本、宋刻本和宋端平刻本，均藏国家图书馆；还有傅增湘旧藏一部嘉定四年（1211）同安郡斋刻本，仅存《辨证》，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该清官旧藏本所载《离骚》，《目录》及正文均不称“离骚经”，径题“离骚”。宋端平本小注称：“《释文》无经字。”小注又称“离骚九歌第二”，“一本此篇以下皆有传字。”检该本亦无“传”之字，倒与端平本同。此外未附《辨证》与《后语》，有可能是原书阙佚，也可能是宋代《集注》的单行本，推断应是朱熹逝后刻得较早的一个本子（参《宋本〈楚辞集注〉考述》）。而赵万里则称章贡郡斋本属“传世最早刻本”（参《中国版刻图录》），其版刻的相关细节还有待继续讨论。

此本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诸印，所钤副叶三玺为大三玺，旧为清宫天禄琳琅后编藏书。据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中文移交书登记簿》，该本系1954年12月23日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移交，计二函八册（采第53959号），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